以文學之眼眺望人間風景

台文館圖書室「生命・文學與書寫」講座後記

文／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　　攝影／潘佳君

2013年9月至11月間，在台灣文學館靜謐而溫馨的圖書室，我們邀請了4位以筆為工具、以文字為媒介，在不同角落向台灣乃至世界發聲的女性創作者，分享其生命經驗與書寫歷程，引領讀者走進充滿知性、智識與社會關懷的文學天地。

到訪過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觀眾或許都知道，座落於本館館舍地下一樓的圖書室，是一處雅緻而溫馨的閱讀空間，不但擁有數萬冊台灣文學相關讀本，同時定期配合館內展覽推出各項主題書展，堪稱愛書人不可錯過的文學寶庫。然而，在靜謐沉緩的書香味之外，我們一直希望能以更活潑的方式，為這個空間灌注熱絡的氣息，讓文學與讀者產生有機的連結。2013年10月，適逢台灣文學館十週年館慶，在構思各項慶祝活動時，我們以上述思路為前提，策劃了「打開世界之窗，眺望人間風景——生命・文學與書寫」系列講座，聚焦於生命與文學、社會與書寫的交會，邀請4位以筆為工具、以文字為媒介，在不同角落向台灣乃至世界發聲的女性創作者，分享其生命經驗與書寫歷程，引領讀者走進充滿知性、智識與社會關懷的文學天地。

楊索談自身與故鄉、故土和故人的情感交織及感懷思慕。

楊索：惡地裡開出一朵大紅花——《惡之幸福》的可能

首先為這場講座揭開序幕的，是以報導文學起家、新聞記者出身的作家楊索。從2007年的《我那賭徒阿爸》到2013年的《惡之幸福》，六、七年間僅有兩本著作問世，即使以最低標準來看，楊索都稱不上是個多產的作家；然而在她筆下，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始終真誠的創作者，如何執持文字的利劍，以無畏到近乎殘酷的筆觸，將個人乃至家族的傷痕與痛楚赤裸裸地揭露在讀者眼前——她坦言父親的賭、母親的病，直視親屬手足之間的情感撕扯與斷裂，也剖白自己孤身浮沉人海的掙扎與顛躓……，在在都是支離破碎的生命碎片。然而，早期《我那賭徒阿爸》中所流洩的暴烈憂傷，在數年後的《惡之幸福》中，似乎已逐漸沉澱為平和寬容的基調，由此，我們可以察覺，作家藉由書寫完成了一場艱辛的自我療癒，也以此撫慰無數與其有著近似遭遇的心靈。

在文學館圖書室舉行的這場講座，據說是楊索在南台灣的首度登台，她以「惡地裡開出一朵大紅花——《惡之幸福》的可能」為題，暢談自身與故鄉、故土和故人的情感交織及感懷思慕。從童年時期與漫畫和武俠小說的結緣說起，楊索提及小學二年級在上學途中，深深為路旁盛開的粉白茶花所

吸引，想來這正是人生美感經驗的初初啟蒙，奠定了她往後踏上文學之路、追求心靈與精神滿足的基石。接下來，作家以生命中的重要他者或生活面向為子題，包括：家鄉、祖父、祖母、父親、母親、成長、生活、愛情、反省、未來等，從作品中擷取片段文字，先是輕聲誦讀，再娓娓道來與其相關的經驗與反思。例如家鄉，是少小離家卻因好賭而翻不了身、一輩子無法衣錦榮歸的父親回不去的彼岸；例如祖母，是成長過程中不易領會父母親情的楊索，最重要的守護者，她從祖母身上看到上一代女性的堅韌、紀律與勤奮，也獲得其疼惜與肯定；此外，還有她與孱弱多病的母親之間彷彿永無止息的衝撞與叛逆、青春期的失學與戲劇化的生涯轉折、「其實沒什麼好說」的愛情、生命中最重要的原鄉「勵行市場」……。走過無數高原與低谷，而今已步入中年的楊索，自言其心境終於漸漸柔軟澄明，始有餘裕細細品嚐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的人生況味。而在一幕幕快速變換的人生場景中，作家不厭其煩向我們訴說的，無非是以文字為心靈依歸，在其中獲得安頓與救贖的秘密。

張桂越：巴爾幹不只是火藥庫——一本雜誌的世界視野與社會關懷

相隔數週後的第二場演講，是由資深媒體工作者、《周刊巴爾幹》（*The Balkans*）的創辦人張桂越談「巴爾幹不只是火藥庫——一本雜誌的世界視野與社會關懷」。

張桂越曾擔任華視、台視駐英國特派員，1996年在倫敦獨立成立「台通社」，提供台灣各大電視台歐洲訊息，她以對新聞的敏感、對世界的熱情，長年隻身在歐洲闖蕩。1999年，因緣際會之下，她前往馬其頓，見證了台馬建交的歷史時刻，不到兩

張桂越創辦《周刊巴爾幹》，為的就是搭起台灣和馬其頓的橋樑。

年半，兩國斷交，她卻在那裡一待就是十幾年。時間，累積了張桂越對馬其頓的認識和理解，翻轉了教科書、CNN或是路透社所塑造的「馬其頓＝火藥庫」刻板印象，也成為她創辦《周刊巴爾幹》的契機——有感於台灣人對國際事務的陌生，2012年10月，在僅有的5萬元「預付款」支持下，《周刊巴爾幹》誕生了，除整理巴爾幹半島上11個國家的一周大事，同時也介紹古希臘文化所孕育的歷史文明、宗教、民情、美食、建築，甚至是馬路邊攔截的消息，為的就是搭起台灣和馬其頓的橋樑，提供台灣人一個擴張視野、走向世界的機會。

棉T、嬉皮風牛仔褲、螢光色球鞋、滿是家私的大包包……，你很難想像，眼前這位擁有30年資歷的記者，已經年逾花甲；當然，另一個原因是，這把年紀還這麼「敢」——敢做夢、敢冒險、敢為了理想大步出走、一擲千金的人，恐怕實在不多。講到自己在巴爾幹十多年的生活經驗，張桂越快人快語地將那雙張望著世界的眼睛所見繽紛繁麗的景象，一一投影在聽眾眼前：初抵巴爾幹，她遇上的就是友善而親切的記者、叨絮所有人生經歷的計程車司機、會因為她幾天沒出現在菜市場而關心「妳這兩天怎麼沒來？」的小販；還有獨特豐富的宗教體驗、風格迥異的村莊建築、以無花果做成蜜餞招待來客的傳統風俗、罌粟花籽做成的蛋糕、有著「南斯拉夫的披頭

四」之稱的Rock Road樂團……。透過日常可見的眾生相，她一點一滴地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新的巴爾幹圖像；而在破除「火藥庫」的迷思之餘，其念茲在茲試圖傳遞給聽眾的其實是：先腳後腦，先走後想。「我如果能站在這個地方與大家分享巴爾幹不是火藥庫，不是因為我的腦袋、我從哪裡獲得的資訊，而是我用『腳』踏出那一步，走了出去。……如果不是用自己的雙腳走出去，我無法擁有那些切身的體驗，更不會有這些認識。」不過她也補充說明，這並不是要大家「不思」，而是希望能藉此稍稍平衡歷來所遵循的「三思而後行」的教育方針，因為，「一旦你想得太多，你就走不動，哪裡也去不了。」

鄭美里：說寫女性生命故事——《遇合》與「遇合」

鄭美里認為每個人都有故事，每個故事都值得被訴說、被傾聽。

不同於前兩位講者講述自身的創作成果與心路歷程，帶領寫作班與成長團體的鄭美里，則是以她所主編的《遇合——外省／女性書寫誌》一書為例提醒大家：每個人都有故事，每個故事都值得被訴說、被傾聽，而每一個「我」，就是這些故事的最佳書寫者和記錄者。

顧名思義，《遇合》說的是一群人相遇與聚合的故事，這當中也隱喻著相異群體摩擦和衝撞後的傷口療癒與縫合；這是外省台灣人協會為了促進台灣各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、特別是打破一般人心目中對「外省人」的既定想像，持續舉辦「蒲公英外省女性．生活史寫作工作坊」後所催生的三本成果集之一。寫作班成員主要限定於女性，有無外省身分並非絕對必要條件，重要的是，如何以寫作為策略，讓普遍在公領域較無發言權的女性跨越那道自我設限的隱形門檻，主動言說其獨有的生命歷程，包括人生的起點、遷移、落地生根、身體、醫療乃至愛情等各面向的體驗。希望藉由生命故事的分享，促進不同族群、階級、年齡女性之間的對話，從而看到與「我群」不同的生命風景；經由這樣的「遇合」，獲致過往歷史所留下傷痕的「癒合」。

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畢竟「寫作」在大部分人心目中，多少都沾染了一點崇高神聖的色彩，於是，怎麼讓寫作班的婆婆媽媽們樂於且勇於訴說自己的故事，就需要一點巧思的運用了。演講現場，鄭美里抽繹出《遇合》中的部分篇章，極其動人地演示了女性在戰亂流離的大時代中不由自主的命運；此外，她也信手拈來幾個與文字、聯想相關的小遊戲和聽眾互動，包括詞語接龍、聯想接龍、數字隨想等，不僅帶動了氣氛，同時輕鬆地讓聽眾體會「寫作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」，因為「交談」和「話語」往往就是最好的創意前導。凡夫俗子者流，不免有「自視甚低」的傾向，不是以為自己沒有故事可說，就是以為那些故事平庸得不值一提；遇到這個問題，鄭美里把文壇「祖師奶奶」張愛玲說過的話搬了出來：「比較天才更為要緊的是普通人。一般的來說，活過半輩子的人，大都有一點真切的生活經驗，一點獨到的見解。他們從來沒想到把它寫下

來，事過境遷，就此淹沒了。」而除了保存個人情感和群體記憶，鄭美里最後以其豐富的寫作班講師資歷告訴我們，寫作，「讓我走進自己，因而也走向了全世界。」只要我們一直磨這支筆，總有一天，所有的傷口都會得到療癒，心靈也終將真正安住。

顧玉玲：《我們》的寶島，他／她們的《逃》、《離》

當有人說台灣是美麗的寶島、是「我們」美好的家園，究竟有哪些人被含括在這個「想像的共同體」當中？大學時期參與學運、經歷解嚴，多年來堅守社運陣營，關注東南亞外籍移工、配偶相關議題的顧玉玲，帶來的最後一場演講，談的正是在台灣這個猶如小型聯合國的場域中，以所有人為分母的「我們」的故事。

2008年，顧玉玲獲得第九屆台北文學獎「文學年金得主」的殊榮，她根據近身的觀察參與，以幾位菲律賓移工在台灣的生命圖景為經緯，加上對自身經驗的召喚，將父母親的故事穿插於其中，交織出一部名為《我們》的作品，在其中，她向讀者提出探問：如果有一條存在於認知當中的「我群」與「他者」的界線，那究竟是被設定在島嶼邊緣還是內部？「台灣有那麼多老人家，在人生最後的五年、十年，是由許多外籍勞工把屎把尿、陪伴度過；過去20年來台灣的各項重大工程建設，三號國道、高捷、高鐵……，無一不是這些外籍勞工的血汗付出，但是我們好像看不到他們，因為存在著各種『社會排除』的方式，讓『我們』對『他們』陌生且無視。」用文學作品來回應社會議題，她說，其實只是因為一點點不甘心，「不甘心未來的台灣當代史，只有達官貴人的紀錄，但我所經歷的這些精采的人事物，怎麼可以不算數？」

多年來堅守社運陣營，關注東南亞外籍移工、配偶的顧玉玲，談以所有人為分母的「我們」的故事。

快速播放的投影片，伴隨著顧玉玲日日夜夜與外籍移工、配偶們一起工作、一起生活的過程中所親歷的種種：想要「念一首詩」的越南移工、信仰回教卻被雇主強迫吃豬肉的印尼移工、在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聚會遭到當地居民連署反彈的菲律賓移工，以及在條件不具足的情況下「想盡辦法透過婚姻追求可能的幸福」的外籍配偶……。這些踟躕於台灣社會邊緣的「異鄉人」，並沒有被她以「旁觀者」的角度進行所謂「客觀」、「中立」的描述，相反地，顧玉玲逆寫報導文學的常規，大剌剌地讓「我」涉入其中，用「我在場」的方式不疾不徐地訴說，從而，使得這些故事擁有了真切而實在的屬於人的溫度。

> 我們是鏡，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彼此注視，並為對方呈現，你可以看到我們，你可以看到自己，他者在我們的視線中觀看。

最後，她唸起了2001年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公告，以這段文字為「我們」（台灣人）與外在他者的關係做了一個最貼切的註腳，她說：「當我們與邊緣弱勢者接觸的時候，就像是照鏡子，彼此照見，同時也看到自己的偏見、侷限和歧視。如何改變、如何學習彼此善待？我想這會是最有意義的啟示。」